

贡斯当与伯林的自由观比较

余宜斌

(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 佛山 528225)

【内容摘要】不少学者认为,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来源于贡斯当的两种自由概念,并且与贡斯当的两种自由概念存在着完全对应的关系,其实不然,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与贡斯当的两种自由概念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本文的目标就是分析他们的理论之间存在的差异。

【关键词】现代自由 古代自由 消极自由 积极自由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1)09-0118-04

伯林在他的著名论文《两种自由概念》中对法国19世纪自由主义理论家邦雅曼·贡斯当大加赞赏,认为贡斯当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是讨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概念的最好的文章,并自称自己的两种自由概念来源于贡斯当的两种自由概念。对于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概念之间存在的冲突关系,他说:“没有人比贡斯当对这两种类型的自由之间的冲突看得更透彻,或表达得更加清楚。”^{[1](P236)} 本文认为,伯林对贡斯当的赞赏与推崇掩盖了他与贡斯当之间存在的分歧。贡斯当认为他的两种自由之间并不完全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需要通过恰当的制度安排很好的结合在一起的关系。此外,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与贡斯当的两种自由概念并不存在着完全对应的关系,而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本文的目标是对贡斯当与伯林的自由观进行对比研究,揭示二者之间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

一、贡斯当的现代自由与伯林的消极自由

贡斯当的现代自由与伯林的消极自由在定义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贡斯当的现代自由是指现代人的思想中已经形成的自由观念,现代人所理解的自由首要作用就是保障现代人的私有生活的独立性,不受来自公共权力的任意干预。对于现代人而言,这种自由观念表现为现代人所享有的一系列的权利。这些权利具体而言包括:“只受法律制约、而不因某一个人或若干个人的专断意志而受到某种方式的逮捕、拘禁、处死或虐待的权利,它是每个人表达意见、选择并从事某一职业、支配甚至滥用财产的权利,是不必经过许可、不必说明动机或事由而迁徙的权利。它是每个人与其他个人结社的权利,结社的目的或许是讨论他们的利益,或许是信奉他们以及结社者偏爱的宗教,甚至或许仅仅是以一种最适合他们本性或幻想的方式消磨几天或几小时。最后,它是每个人通过选举全部或部分官员,或通过当权者或

多或少不得不留意的代议制。申诉、要求等方式,对政府的行政行使某些影响的权利。”^{[2](P26)}

贡斯当用一系列具体的权利来界定他的现代自由概念,理解起来没有任何困难,也不会产生任何歧义。相比之下,伯林的消极自由概念似乎要抽象得多。伯林的“消极自由”是“免于……”的自由(free from doing sth.)。伯林指出:“我们一般说,就没有人或人的群体干涉我的活动而言,我是自由的。在这个意义上,政治自由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能够不被别人阻碍地行动的领域。如果别人阻止我做我本来能够做的事,那么我就是不自由的,如果我的不被干涉地行动的领域被别人挤压至某种最小的程度,我便可以说是被强制的,或者说,是处于奴役状态的。”^{[1](P189)} 伯林的这个消极自由概念要求不被别人干涉,不受干涉的领域越大,自由也就越广。

伯林的这种抽象的消极自由概念引发了诸多的批评。当代著名的政治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指出,伯林的消极自由概念过于强调不受干涉,而没有指出哪些方面不受干涉,所以,它是一种纯粹机会意义上的概念,这种纯粹机会意义的自由概念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需要判断的是什么东西对人的生活是重要的,限制人表达自由宗教和伦理信念的自由比限制人去荒无人烟的地方的自由更为重要,而这两者又都比交通管理这些细枝末节更为重要。”^{[3](P77)} 比如,在阿尔巴尼亚,不存在宗教信仰自由,在英国,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同时,在阿尔巴尼亚,交通信号灯很少,开车很自由,而英国的交通信号灯却比阿尔巴尼亚多许多,开车很不自由。伯林的消极自由概念只关注机会的多少,而没有区分哪些是关系重大的机会,而哪些则是无足轻重的机会,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机会意义的消极自由概念,只考虑从自由的量,而没有考虑到自由的质。由于缺乏定性的内容,不加区分地把所有类型的自由都视为自由,把所有类型的阻碍都

* 作者简介:余宜斌(1971-)男,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政治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自由主义民主理论。

视为消极自由的对立物。这样一来,宗教自由与交通自由之间也就不存在高低之分,自然也就无法判断自由国家与非自由国家了。既然不能用来判断哪些国家是非自由国家,伯林对消极自由概念的捍卫也就失去了意义。消极自由取决于什么是重要的人生目标、价值目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判断出有些限制是与自由不相干的,而另一些限制则是必须加以消除的。

泰勒提出的批评表明,伯林的消极自由概念的定义上一种纯粹机会意义上的概念的消极自由存在的严重问题。不过,泰勒的批评并不适合伯林对消极自由概念的进一步的阐述。事实上,伯林在对消极自由的进一步详细阐述当中已经注意到了泰勒所说的重要性概念。伯林认识到,自由并不是不加区分地要求不受限制的范围越广越好:“自由并不只是不存在任何一种挫折;这样的定义自由将扩张这个词的意义以致它含义太多或含义全无。”^{[1](P190)}伯林的消极自由所捍卫的是有限度的:“应该存在最低限度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自由的领域,因为如果这个领域被践踏,个人将会发现他自由处于一种甚至对于他的自然能力的最低限度发展也嫌狭隘的空间中,而正是他的那些自然能力,使得他有可能追求甚或领会各种各样人们视为善良、正确或神圣的目的。”^{[1](P191-192)}这个领域包括贡斯当所说的宗教、言论、表达、财产权利。而这正是贡斯当的现代自由所包含的内容。

与贡斯当的现代自由概念相比,伯林的消极自由概念确实存在着含糊不清之处:一方面抽象地主张一种机会意义的概念,另一方面又主张一种具有重要性意义的概念。

二者的不同点还在于,贡斯当的现代自由是受时空限制的,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伯林的消极自由则似乎与历史无关,其存在主要依赖于一种哲学观念,即价值多元论。

贡斯当非常明确地将他的现代自由与现代社会的兴起关系起来,着眼于从历史角度入手对现代自由的产生的原因进行解释。贡斯当指出,现代人之所以特别珍视个体的独立,是与现代社会当中的最主要的特征分不开的,这个特征就是商业活动成为现代人的主要活动,占据着现代人的大部分时间与精力,使他们无暇顾及其他方面的活动,特别是像古代人那样参与政治活动,同时,也没有必要参与政治活动。因为商业活动本身已成为现代谋取财产的主要方式,而且能够让他们获得比政治活动更大的成功和影响力。

另外,贡斯当特别指出,现代人不同于古代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现代人非常希望得到快乐,“在今天的时代,那些挚爱自由,将自由置于法兰西解放之上的人们,也就是那些热爱生活中所有快乐的人们,这些人尤其珍视自由,他们把自由视为他们所珍爱的快乐的保障。”^{[2](P36)}

如果说贡斯当的现代自由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的,那么,伯林的消极自由则似乎与历史无关。他非常明确地把消极自由建立在他的价值多元论的哲学理论之上,而他的价值多元论却不是现代社会才出现的。所以,他的消极自由自然也是并非是现代社会的产物。

伯林对于消极自由的辩护是基于他的价值多元论。他的价值多元论主张人类生活中固有的多元价值的冲突是永远都不可能消除的。坚持消极自由的信念目标就是使得这

些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相互宽容共存。伯林说:“我们在日常经验中所遭遇的世界,是一个我们要在同等终极的目的、同等绝对地要求之间做出选择,且某些目的的实现必然无可避免地导致其他目的牺牲的世界。的确,正是因为处在这样地状况下,人们才给予自由选择以那么大的重要性。”^{[1](P241)}消极自由的目标就是捍卫个体自由选择某项终极价值。

贡斯当的现代自由与伯林的消极自由的更重要的不同点还在于,伯林对他的消极自由几乎是毫无保留地加以推崇和捍卫。伯林在他的文章《两种自由概念》当中,对于他的消极自由可能具有的消极因素却只字未提。而在贡斯当看来,他的现代自由并非完善无缺,他指出了现代自由的过度追求带来的危害在于:“由于我们沉溺于享受个人的独立以及追求各自的利益,我们可能过分容易地放弃分享政治权力的权利。”^{[2](P44)}过度追求现代自由会导致忽视政治义务,纵容政府权力的膨胀,进而危害现代自由本身。贡斯当特别强调,公民的政治冷漠是暴政和专制政府所求之不得的。公民的现代自由的最有效的保障来自公民自身。

二、贡斯当的古代自由与伯林的积极自由

贡斯当的古代自由与伯林的积极自由之间存在的分歧更为明显。

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贡斯当的古代自由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活动。贡斯当的古代自由实际上就是民主理论家们所讨论的民主。而伯林的积极自由主要是指个体的自我实现活动。

贡斯当的古代自由非常明确地是指公民参与政治事务的权力,古代人的目标是在有共同祖国的公民中间分享政治权力,这就是古代自由。具体而言,古代自由包括:“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部分:诸如在广场协商战争与和平问题,与外国政府缔结联盟,投票表决法律并作出判决,审查执政官的财务、法案及管理,宣召执政官出席人民的集会,对其指责、谴责或豁免。”^{[2](P26-27)}在古代社会,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是在所有的私有关系中却永远是奴隶。

伯林的积极自由概念要比贡斯当的古代自由复杂得多、晦涩得多。一方面,伯林的积极自由概念就是贡斯当的古代自由概念,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另一方面,伯林的积极自由概念还包括一切自我实现的活动。而且这后一方面才是伯林真正想要认真讨论和研究的对象。具体而言,积极自由是指:“‘自由’这个词的‘积极’含义源于个体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的愿望。我希望我的生活与决定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取决于随便哪种外在的强制力。我希望成为我自己而不是他人的意志活动的工具。我是一个主体,而不是一个客体;希望被理性、有意识的目的推动,而不是被外在的、影响我的原因推动。我希望是个人物,而不希望什么也不是;希望是一个行动者,也就是说是决定的而不是被决定的,是自我导向的,而不是如一个事物、一个动物、一个无力起到人的作用的奴隶那样只受外在自然或他人的作用,也就是说,我是能够领会我自己的目标与策略且能够实现它们的人。当我说我是理性的,而且正是我的理性使我作为人类的一员与自然的其他部分相区别时,我所表达的至少部分就是

上述意思。此外,我希望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思想、有意志、主动的存在,是对自己的选择负有责任并能够依据我自己的观念与意图对这些选择做出解释的。我相信这是真实的,我就感到我是自由的;如果我意识到这并不是真实的,我就是受奴役的。”^{[1](P200)}由此可知,自我引导及自我主宰,做自己的主人是积极自由的根本意义。

二者的第二个不同之处在于,虽然贡斯当认为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之间存在冲突,但是,他仍然主张古代自由对于现代人而言具有积极的、必不可少的意义。而伯林对于他的积极自由概念则持有消极、悲观的态度,没有论及它的积极意义。

贡斯当描述了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之间存在的内在冲突性:“你几乎看不到他们享受任何我们上面所说的现代人的自由。所有私人行动都受到严厉监视。个人相对于舆论、劳动、特别是宗教的独立性未得到丝毫重视。我们今天视为弥足珍贵的个人选择自己宗教派别的自由在古人看来简直是犯罪与亵渎。社会的权威机构干预那些在我们看来最为有益的领域,阻碍个人的意志。在斯巴达,Therpanthus 不能在他的七弦竖琴上加一根弦,以免冒犯五人长官团的长官。而且,公共权威还干预大多数家庭内部关系。年轻的斯巴达人不能自由地看望他的新娘。在罗马,监察官密切监视着家庭生活。法律规制习俗,由于习俗涉及所有事物,因此,几乎没有哪一个领域不受法律的规制。”^{[2](P27)}

同时,贡斯当对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之间的冲突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了解释,说明了古代人之所以放弃享受现代自由的合理性。他认为,古代自由是古代社会所必需的,因为所有的古代政治共同体都面积很小,面积狭小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这些共同体的精神都是好战的,每个公民无休止地攻击其他国家或遭到其他国家的攻击。所有的国家都不得不以战争为代价来换取安全、独立以及生存,战争迫使古代公民养成积极参与政治与军事活动当中,并且将公民的私人生活必置于政治生活之下,将公民的个人需要置于国家的需要之下。因此,在古代社会,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是在所有的私有关系中却永远是奴隶。另外,贡斯当指出,对于古代人而言,战争除了具有政治作用之外,还具有经济作用。战争是古代人获取财富的基本方式之一。一场成功的战争可以增加私人的财富,也可以增加公共的财富,并且还能得到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即奴隶。而奴隶劳动又进一步将公民从纯粹的经济活动当中解放出来,将所有的时间与精力都投身到政治活动当中,投身到下一次战争当中去。

贡斯当认为,对于现代社会的公民而言,需要将现代自由与古代自由完美地结合起来。在现代社会,商业活动已经取代了战争,成为公民获得财富与成功的主要方式,这使得现代公民不再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一味地追求个人财富、个人权利与个人快乐,甚至对于政治活动持有冷漠态度,这会导致公民无法有效切实保障他们的正当权利。因此,对于维护现代人所珍视的现代自由而言,古代意义的自由也是必要的。为此,现代社会应当采用代议制度。因为“代议制度是这样一种组织,一个国家可以凭借这种组织安排少数个

人去做国家自身不能或不愿做的事。穷人照料自己的事,富人雇佣管家。这就是古代和现代民族的历史。代议制度就是,大众希望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没有时间去自己保护自己的利益,于是委托一定数量的人做他们的代表。不过,除非是白痴,任何雇佣管家的富人都会对管家是否尽职进行密切监视,以防止他们玩忽职守、腐败堕落或昏庸无能;此外,为了评价这些代表的管理,那些深谋远虑的土地所有者会对各种事务以及他们委托代理人所进行的管理保持良好的了解。同理,那些为了享有适合于他们的自由而求诸代议制度的人们也必须对他们的代议员行使一种积极而持续的监视,必须保留权利,以便当代议员背弃了对他们的信任时将其免职,当他们滥用权力时剥夺其权力。”^{[2](P44)}

同时,贡斯当还认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政治自由还具有道德价值,因为完全沉溺于个人的利益与快乐之中并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的事业将会变得狭窄,我们的最终目标将得不到升华。在我们中间,任何人如果希望贬低自己、限制自己的道德能力、降低自己的欲望、放弃行动、荣誉以及深沉而慷慨的情感,都不可能不降低自己的人格,都不可能得到快乐。”贡斯当指出,“我们的本性中有更好的部分,这就是趋使并折磨我们的那种高尚的忧虑,这就是希望拓宽我们知识以及发展我们能力的那种欲望。我们的使命要求我们的不仅仅是快乐,而且还有自我发展,政治自由是上帝赋予我们的最有力、最有效的自我发展的手段。政治自由把对公民最神圣的利益的关切与评估毫无例外地交给所有公民,由此丰富了公民的精神,升华了他们的思想,在他们中间确立了某种知识平等,这种平等构成一个民族的荣誉与力量。”^{[2](P45)}

贡斯当对古代自由概念所蕴含的政治参与自我实现等价值充分肯定并充满乐观态度。伯林则与此相反,在伯林看来,公民的政治参与,即民主制度,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因为“民主可能会解除一个既定寡头、一个既定特权个人或若干个人武装,但是它会像任何一个先前的统治者一样残忍地压制个人。”^{[1](P236)}民主解决的问题是谁拥有权力的问题,而不是权力行使的边界问题。民主政府同样存在着滥用权力侵犯个体自由的可能性,甚至这种可能性还会更大,因为阻碍民主政府行使权力的因素要比其他类型的政府更少。

而且,伯林对贡斯当所推崇的自我实现充满担忧和悲观态度,认为追求自我实现最终有可能会导向现代极权主义或专制主义政治。伯林把这个过程概括为这样几个步骤:“首先,所有人都有一个且只有一个真正目的,也就是理性的自我导向的目的;第二,所有理性存在者的目的必然组成一个单一、普遍而和谐的模式;对于这种模式,有的人比其他人更能清楚地领会到;第三,所有的冲突,因此所有的悲剧,都源于理性与非理性或不充分理性——生活中的不成熟与未发展的成分,不管是个体的还是共同体的——之间的冲撞,而这种冲撞原则上是可以避免的,在完全理性的存在者那里则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后,当所有人都被造就成理性的时候,他们将服从出自他们自身本性(这些本性在所有人中都是同一与一致的)理性规律,因此成为完全服从法律的与完全自由的人。”^{[1](P226)}在这几个步骤当中,最主要的就

是第一步骤,即追求自我实现的人往往都坚信所有人都有一个且只有一个真正目的,或者说只有最高的价值。其他价值都必须服从于这个最高价值。伯林把这个观念称为价值一元论。价值一元论者的头脑当中有一个共同的核心信念,即所有时代的所有人的终极目标,其实是一样的:“无论何时何地,人性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地域或历史中的多样性,与恒久不变的内核相比是不重要的,因为人所以为人,也正是因为这个内核,这与定义动物、植物或矿物的道理相同;存在着普遍适用的人类目标。”^{[4][P1]}可以依据这个普遍性的人类目标来要求所有人,伯林认为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强制,导致对自由的侵犯。

三、总结

综上所述,贡斯当的现代自由与伯林的消极自由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贡斯当的现代自由内涵较为明确,是指现代人所享有的一系列的权利。现代自由观念的产生与现代社会中商业活动的兴起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伯林的消极自由概念较为抽象,存在着含糊不清之处:从消极自由的定义来看是指不存在一切阻碍因素,而后来的阐述则是指对于某些至关重要的权利方面不存在阻碍因素。另外,消极自由的产生依赖于一种哲学观念,即价值多元论。二者的不同点还在于,贡斯当的现代自由是受时空限制的,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同时存在着消极因素。而伯林的消极自由则缺乏具体的历史性因素。

贡斯当的古代自由与伯林的积极自由之间分歧更大。贡斯当的古代自由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活动,而伯林的积极自由主要是指自我实现的活动。贡斯当认为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之间存在冲突,但是,他仍然主张古代自由对于现代人而言具有积极的、必不可少的意义。而伯林对于他的积极自由概念则持有消极、悲观的态度,认为它应当为极权主义负责。贡斯当认为古代自由是古代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

伯林积极自由的产生主要是价值一元论这种哲学观念。

在贡斯当与伯林的自由理论之间的分歧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方法论上的差异。贡斯当运用的是社会学方法论,立足于现实来解释自由概念。他认为,古代自由主要是古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的战争因素的产物,而现代自由则是现代人把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从战争活动转移到商业活动当中的结果。

如果说贡斯当的基本方式是从现实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产生,那么,伯林就恰恰相反,他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现实。作为杰出的现代分析哲学大师,伯林把人类社会的重大问题都归结为观念问题。他很欣赏德国诗人海涅的观点:“不要轻视观念的影响力,教授在沉静的研究中所培育出来的哲学概念可能摧毁一个文明。”^{[1][P187]}在伯林看来,消极自由概念的基础不在社会现实当中,而是在价值多元论这个观念当中,同样,积极自由概念的基础就在于价值一元论当中。从观念上来看,价值多元论与价值一元论,就是哲学史上的一与多,这二者之间关系如同善与恶一样,只有对立与冲突的关系。

正是由于方法论上的不同,伯林主张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间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关系,而贡斯当则试图将他的两种自由统一起来。

参考文献:

- [1][英]以赛亚·伯林.胡传胜译.自由论[M].译林出版社,2003.
- [2][法]邦雅曼·贡斯当.阎克文、刘满贵译.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M].商务印书馆,1999.
- [3][加拿大]查尔斯·泰勒.达巍译.消极自由有什么错[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 [4][英]以赛亚·伯林.冯克利译.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M].译林出版社,2002.

(上接第104页)间历来存在着深刻的错位,在崇高的背后是残酷,在绝对的边缘是暴力和专制,在斗争哲学的遮掩下是亲友间的相互出卖与倾轧、人性的丧失和良知的泯灭。当雅罗米尔决定将恋人的哥哥举报之时,他是怀着一个“人们更加相爱”的幻想;当红头发姑娘出狱后幻想诗人雅罗米尔是因为自责而自杀殉情之时,可雅罗米尔只是窝囊地死于因打架受凉而感染的肺炎。年轻的诗人短暂的一生在执着寻求“别处”的异样生活,而他找寻的结果是黯然死去。在追求崇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悲剧的深渊。

“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迷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之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6][P2]}雅罗米尔在执着追寻自我的存在,被未来和“别处”所诱惑,被主义和口号所愚弄,被自己所追求的崇高所嘲弄,在寻求理想和天堂的过程中,糊里糊涂地走进了地狱。这样,爱情丧失了其崇高性,便显露出现代人精神与灵魂的贫乏。

昆德拉自己说过《生活在别处》不是在记录社会与历史,他不愿像巴尔扎克那样作社会的书记,也并非批评政体,批评政体无异于运送木材进树林,小说的主题是存在主

义的抒情性^[7]。他是在历史背景下的“实验性的自我”的“可能性”中引领读者思考。思考人的生命中存在的一系列的主题:崇高与卑琐、轻与重、遗忘与记忆、灵与肉、爱与性、生命的偶然等等,借助于小说人物与外部世界的双重对话,从不同视角建构对存在的探索和质询,力求去重新发现和确立生存境遇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 [1]昆德拉.景凯旋、景黎明译.生活在别处[M].作家出版社,1989.
- [2]布勒东.第二次超现实主义宣言[M].张秉真、黄晋凯主编.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 [3]李凤亮.诗·思·史:冲突与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M].商务印书馆,2006.
- [4]昆德拉.许钧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上海译文出版社.
- [5]昆德拉.董强译.小说的艺术[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 [6]昆德拉.李若明译.玩笑[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
- [7]昆德拉.杨乐云译.作者的话——1996年阿特兰蒂斯出版社〈不朽〉代序[J].外国文学动态,1997(4).